

《纵横》精品书系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中国外交大写意

《纵横》编辑部 编



新中国外交大写意

《纵横》编辑部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外交大写意/《纵横》编辑部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1

(纵横精品书系)

ISBN 7-5034-1130-9

I. 新… II. 纵… III. 外交史-史料-中国 IV.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46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梨园彩印厂

装 订: 铁成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625 字数: 274 千字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7.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1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曲折历程

——周恩来与四任联合国秘书长 杨明伟

19 新中国派赴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团 卢 弘

40 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的关键一票 梁子藩

46 我向联合国递交《中英联合声明》 凌 青

51 中苏协商与抗美援朝决策的最终形成 曲爱国

74 1954 年赫鲁晓夫访华及援华方案的签约

..... (苏) 唐·伊·戈瓦尔 王水明译

84 米高扬的三次中国之行 杨宗丽

99 李先念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程振声

107 “乒乓外交”的台前幕后 钱嘉东 王 立

119 “乒乓外交”史话 熊向晖

143 我参与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 唐龙彬

1

目

录

- 156 瞩目世界的握手
——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 南 山
- 197 里根总统夫妇访问中国纪事 张 颖
- 203 邓小平访美礼宾工作亲历纪实 唐龙彬
- 217 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 王效贤
- 226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的日日夜夜 刘德有
- 240 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唐龙彬
- 247 从亚非学生会议看世界风云 钱李仁
- 266 周恩来出访非洲 杨明伟
- 300 我所经历的“文艺外交” 资华筠
- 314 围绕 1962 年雅加达亚运会的斗争 何振梁
- 319 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 吕正操
- 322 “文革”年代的中蒙关系 孙一先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曲折历程

——周恩来与四任联合国秘书长

杨明伟

联合国，自从1942年1月1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首次提出设想，并于1945年10月正式成立以来，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促进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重要的影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联合国正迎来它的四岁生日。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联合国理应驱逐蒋介石集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和会议。但是，由于美国的竭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经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第六至十五届大会均以“延期审议”、“不审议”为名，拒不讨论我国代表权的恢复问题。

1961年至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非法决议，将我国合法席位的恢复问题作为必须由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重要问题”。

1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曲折历程

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至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恢复我国席位的提案由首次获得多数票到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被通过，台湾代表被驱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出的代表作为正式代表。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和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直接领导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由此，也与联合国几任秘书长有着许多的交往，因而结下了不解之缘。

联合国成立后，挪威人赖伊当选为第一任秘书长。1950年，周恩来几乎每个月都与他有电报来往

周恩来对联合国的注意，始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时。这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会议，与其他49个国家的代表共同起草了联合国宪章。在中国组团赴旧金山的问题上，作为中国共产党南方中央局书记和在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以及外事工作代言人，周恩来为争取解放区的代表进入代表团，做了多方工作，最后，派出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的另一位负责人董必武，参加了中国赴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

董必武当时与周恩来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在赴旧金山之前，他与周恩来在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有关问题上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到旧金山后，董必武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络。6月26日，董必武与其他中国代表一道，出席了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并在宪章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0月24日，在中国、法国、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多数签字国批准宪章后，联合国正式成立。董必武回国以后，将联合国的有关情况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1946年2月1日，联合国诞生了它的第一位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

赖伊，挪威人，律师出身，曾是挪威工党的重要成员。1940年德国侵占挪威后，赖伊被任命为流亡伦敦的挪威政府外交部长，从而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人注意。在他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初，周恩来正在重庆与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关系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中共在中国的影响，已引起了联合国及其首任秘书长的重视。然而，由于美国的影响和长期隔绝等原因，赖伊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缺乏更多的了解，甚至有许多偏见。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正是赖伊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三年零八个月之日。新生的中国，使这位联合国秘书长感到极大的陌生，以至不愿意接纳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迅即与联合国及其秘书长取得联系。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完全无权代表中国；要求联合国根据其宪章的原则和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活动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此时正值第四届联大在纽约召开，此次大会主要讨论前意属殖民地、原子武器、裁军、朝鲜和巴勒斯坦等问题。由于美国的操纵，大会不仅在原子武器和裁军等问题上的决定违背了世界人民的愿望，而且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不予理睬。

1950年1月8日，周恩来第二次致电赖伊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要求联合国开除非法的国民党代表。19日，周恩来照会上述两人：中国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首席代表，“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已经组成，代表团应“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

4月9日，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研究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会

上确定除派往安理会的代表为张闻天外，派往经社理事会的代表为冀朝鼎，派往托管理事会的代表为孟用潜，派往军事参谋团的代表为周士第将军。随后，他致电赖伊，把上述人员的任命通知联合国。

5月12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赖伊及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负责人，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表现已完全没有资格参加各该组织，必须将这些非法代表从各该组织的各项机构和会议中驱逐出去。

对周恩来的屡次致电、照会以及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赖伊不是没有考虑的，毕竟他是律师出身，熟谙国际法。6月6日，赖伊向59个会员国建议，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赖伊的建议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正当赖伊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感到头疼的时候，波澜又起。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以后，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当年1月10日，苏联代表曾在安理会上发表声明，在台湾当局的代表被开除之前，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的情况下，举行紧急会议，非法通过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号召“武力制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

7月6日，周恩来致电赖伊，代表中国政府声明，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

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安理会，并担任安理会8月份主席。在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和美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的情况下，周恩来分别于8月份三次、9月份二次、10月份三次、11月份二次致电赖伊和安理会主席，斥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的武装侵略罪行。11月，周恩来派出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一行9人，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

略台湾和干涉朝鲜案的会议。在1950年这一年中，周恩来几乎每月都要致电赖伊，向联合国争取我国的合法权利，提出我们的正当要求。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美国非法操纵联合国进一步加剧，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更加艰巨和复杂。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也陷入一个艰难而矛盾的角色中，一方面，他要支持美国的侵略行为，并试图抵制苏联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的提案；另一方面，他又要为“和平使命”而奔走，并呼吁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两面的角色，既遭到苏联否决其重新当选，又遭到了美国的反对。虽然他在未经正式重选的情况下，任期由联大延长了三年，但苏联随即停止承认他为联合国秘书长。1952年11月10日，特吕格弗·赖伊被迫辞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周恩来与赖伊的电报联系，也从1951年后中断。1968年12月30日，72岁的赖伊离开了人世。

第二任秘书长主动请求访华，周恩来说，我们不能拒绝。尽管哈马舍尔德提高了联合国的声誉，但他仍一错再错

从1952年11月10日赖伊辞职时起，联合国秘书长一职足足有五个月处于空缺无人状态。直到1953年4月10日，达格·哈马舍尔德当选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

哈马舍尔德是瑞典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他的外交才能是1947年踏入瑞典外交部时开始显露的。1951年，他作为瑞典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六届联合国大会，次年又以团长身份继续率团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第一期会议。这时他在瑞典国内的职务是不管部大臣。由于他在联大上的出色的工作，不久便在1953年2月24日至4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联大第二期会议上被选为新的联合国秘书长。

哈马舍尔德上任以后，周恩来与联合国秘书长的联系延续下来。但是，哈马舍尔德的秘书长职责仍然受到美国的左右。他上任以后，在8月17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七届联大第三期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提案。但会议却拒绝中国和朝鲜两国代表参加。8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进行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打开了召开政治会议以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但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停战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成立。联大拒绝中、朝两国代表参加会议是不合理的；联合国有责任将有关提案和建议随时通知中、朝两国政府。

根据周恩来声明中的正当要求，联大会议结束后，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向中国政府转来了大会通过的两项决议。周恩来看到这两项决议后，认为，决议只承认苏联作为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而不准许其他有关中立国参加，“这是于逻辑不合的”。9月13日，周恩来致电哈马舍尔德，对联大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提出答复，坚决反对联大在美国操纵下，通过由交战双方举行政治会议的决定。并正式建议：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国家，应该是在朝鲜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一切决议须经交战双方同意；交战双方以外的国家，不仅欢迎苏联，而且须加上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等四个亚洲有关国家。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哈马舍尔德主动致信周恩来，提出访华并在北京与周恩来商谈有关各项问题的要求。

12月16日，周恩来草拟了给哈马舍尔德的两封复信。当天，他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透露：在第一封信中，说明中国政府对判处美国间谍案问题的严正立场，中国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涉；在第二封信中

说，为了和平，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准备在北京接见他，同他商谈有关各项问题。这样既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又不拒绝哈马舍尔德本人来访的请求。周恩来还向尤金表示，我们不能拒绝哈马舍尔德来华访问，否则会陷于被动。

12月17日，周恩来发出了致哈马舍尔德的两封信。在第二封信中，明确表示同意在北京接见联合国秘书长本人。哈马舍尔德接到电报以后，非常兴奋，他毕竟是第一位要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他迅速作好了访华准备。

1955年1月5日，哈马舍尔德飞抵北京，受到了周恩来及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1月5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哈马舍尔德。这是两人首次见面，两位外交家虽然在意识形态、思想观点上不尽一致，但都在为和平而努力。一个小时的会面以后，周恩来举行酒会热情欢迎哈马舍尔德。整个下午，联合国秘书长几乎都在周恩来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度过。晚8时左右，他们又一起共进了晚餐。哈马舍尔德虽是瑞典人，但东方中国的佳肴对他来说也是很可口的。

1月6日，周恩来与哈马舍尔德在西花厅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会谈一开始，哈马舍尔德就提出了上一年底中国判决13个美国间谍的问题。周恩来回答，我们不拒绝谈美国间谍案问题，但必须坚持两个前提：一、联合国就这个问题的决议不能接受；二、我国内政不允许干涉。周恩来详细介绍了美国间谍案的情况，重申了我国政府对该案处理的立场。1月7日，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谈中坦率地对哈马舍尔德说：中国热望和平，但是不会牺牲我们的领土和主权来乞求和平；中国反对战争，但是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过去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今后还会得到证明。我们答应的话是要兑现的，我们遵守的政策是一定会坚持的。1月8日、10日，双方又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会谈。10日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哈马舍尔德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说：我们在会谈

中涉及了有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各项问题；这些会谈是有益的，希望能够继续在这次会晤中所建立的接触。当天下午，由哈马舍尔德的祖国瑞典的驻华大使魏斯特朗举行酒会，周恩来和哈马舍尔德愉快地出席。晚上，周恩来再次设宴，为联合国秘书长饯行。

中国对同联合国秘书长的会谈是极为重视的，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答应的话是要兑现的”。为使会谈中取得的一些共识落到实处，中国政府作出了自己的积极努力。哈马舍尔德离京的第二天，周恩来就整理出与他会谈的主要内容，向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作了汇报。

哈马舍尔德回到联合国总部以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月31日讨论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会议通过决议，首先讨论新西兰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沿海附近的某些岛屿的地区发生武装敌对行动”的提案，然后讨论苏联提出的“美国在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提案。当日，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安理会，讨论新西兰代表提出的议案。

2月3日，周恩来电复哈马舍尔德，声明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新西兰建议，只有在讨论苏联提案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而由真正代表中国的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同意派遣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同时指出，在没有中国参加讨论的情况下，安理会对有关中国问题的决定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哈马舍尔德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仍不死心，当天又通过瑞典驻中国大使维斯特朗向周恩来转达他以个人名义的口信，一方面对新西兰提案作说明和解释，一方面极力劝说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安理会。哈马舍尔德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他又于2月4日晚致电周恩来，试图再加劝说。

2月5日，周恩来接见了瑞典驻华大使维斯特朗，就哈马舍尔德的电报和口信再次作出明确回答。他指出，任何外国或联合国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把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情放在国际舞台上，这是要造成“两个中国”，要割裂中国的领土，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的。他还特意提醒道：“哈马舍尔德先生在北京同我会谈的时候曾经说他要坚持联合国的宪章和原则。那么，我们就要提请哈马舍尔德先生注意：怎么能够把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事情强加在中国政府身上？”周恩来还说，远东的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根源在美国，“如果哈马舍尔德先生愿意推动远东紧张局势的和缓，他在这方面可以劝劝他的美国朋友，要他们表示一下，他们的意愿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

尽管哈马舍尔德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后领导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作出了许多成绩，提高了联合国的声誉和效率，1957年他还以全票再度当选秘书长。然而，联合国仍浓浓地笼罩着美国的阴影。哈马舍尔德也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他在位期间，美国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之类的借口，一直不让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而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很明确，一方面，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积极斗争；另一方面，坚持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正如周恩来1957年11月15日对各国驻华使节所说：

我们愿意在此声明：任何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中，如果出现“两个中国”，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还有其他“中国”，不论是用“中华民国”、“台湾中国”、“台湾政府”、“台湾当局”或其他的名义出现，我们宁可不参加。参加了就是默认，默许其存在。

哈马舍尔德并没能劝说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与台湾代表坐在一起。遗憾的是，他又一错再错，1960年夏天派遣联合国军镇压刚果内部冲突。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出席第十五届联大，提出改组联合国机构，撤销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职务，由东方、西方和中立国家的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取代。1961年2月14日，苏联再次宣布，撤销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承认，指责他为谋害刚果总理卢蒙巴的“同谋者”。

在一片反对声中，1961年9月18日，哈马舍尔德肩负所谓“和平使命”访问刚果，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吴丹，作为第一位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亚洲人，在他的任期中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61年11月3日，一位在年轻时从事过教育事业、当过中学校长的缅甸佛教徒，被联合国大会选举为代理秘书长，以补哈马舍尔德遇难以后秘书长职位的空缺。这位新的联合国秘书长就是缅甸著名的外交家、作家兼翻译家吴丹。吴丹是第一位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亚洲人。他1909年1月22日生，在仰光大学读过书，后来又去英国留学。因此他的思想既有东方文化的传统，又有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使得他在联合国能为东西方国家所接受。1952年他开始出任缅甸驻联合国代表，1957年5月任缅甸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熟谙联合国事务。1959年他还当选为联合国大会副主席。哈马舍尔德去世后，美、苏两大国未能就继任者问题达成协议，遂接受吴丹为折衷候选人，这样，1961年11月3日，吴丹便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吴丹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对中国是有利的。1954年他曾访问过中国，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就在他当选代理秘书长这一年的年初，周恩

来率领由 400 多人组成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对缅甸进行了空前盛大的访问，两国结成了“胞波”关系；这年春天，周恩来还邀请缅甸总理吴努到中国昆明、安宁温泉、西双版纳等地度假；也是在这一年，周恩来与吴努签署了中缅边界议定书，创造了在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范例。作为缅甸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吴丹在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之前，就把中缅友好合作的精神带到了联合国。

吴丹上任时，正值第十六届联大召开。这届联大从 1961 年 9 月一开始，新西兰就适应美国的需要提出一个提案，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把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始得通过。这个提案的目的，周恩来在 9 月 21 日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就一语点明：“其目的是把这个问题挂起来，或者推迟一年，或者交给一个小组委员会去研究，结果仍是拖延。”他对具有远见的蒙哥马利元帅说：“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个程序问题。谁能代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只有如你所说的北京的政府，而不是台湾的蒋介石。如果接受了美国和新西兰的主张，把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当作‘重要问题’来讨论，那就是讨论中国的存在与否，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12 月 1 日至 15 日，联大全体会议讨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在美国的操纵下，以 61 票赞成、34 票反对、7 票弃权通过了由美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和日本等国提出的所谓“任何主张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都是一个重要问题”的提案。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也无力回天，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等待三分之二的多数来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然而，毕竟联大讨论了中国的席位问题，对美国历来在这一问题上设置的重重障碍有了第一次突破。这以后的整个 60 年代，虽然联大年复一年地通过所谓“重要问题”的提案，但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票数却逐年增多。美国及其支持者逐渐成为少数。这一变化，吴丹

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由于吴丹的不偏不倚，使得他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上得到各国的认可，继 1962 年 11 月 30 日他正式当选秘书长后，1966 年 12 月 2 日他又一次当选，使他成为首次连续三任的联合国秘书长。

1970 年 9 月 15 日，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幕。在这次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等 18 国再次提出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大会经过表决，支持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有 51 票，反对的仅 49 票。这是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案的票数第一次超过半数。当这一结果显示出来时，会场四周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内回荡。虽然因不足三分之二多数而未能通过提案，但它却预示着美国能够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日子已经没有多久了。

1971 年 9 月 21 日，第二十六届联大开幕。美国错误估计着形势，企图再次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在会前，美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吴丹递交了一封信和备忘录，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有代表权”，但又主张“应当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意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中国政府立即重申：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吴丹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的，他历来认为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

1971 年 10 月 25 日，历史永远记载着这一重要的日子。这天，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首先表决了美国和日本提出的恢复中国代表权必须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赞成的“重要问题”提案，此案以 59 票反对、55 票赞成、15 票弃权被否决。接着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此案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这样，美国炮制的另一“双重